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征 集 研 究 室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9.875印张 260千字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500册

ISBN 7-80023-077-5/K·124

定价：4.25 元

前 言

为了促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学习和研究，向教学、科研和其他有关方面提供准确的党史资料，同时也反映和交流全国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成果，推动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我们将陆续选编若干本《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1983年1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确定了“在普遍发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转为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扎扎实实地把急需的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的工作方针，通过了《1983至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拟订了一批专题征集研究项目。《规划》要求，上报中央征委会的专题资料，包括三个部分：（1）资料综述，即专题调查报告；（2）有关专题的主要资料和资料目录；（3）关于专题资料搜集、整理、审核情况的工作报告。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在党委领导下，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查阅文献、订正史实，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弄清了一些长期不清楚的问题，产生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研究成果。《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就是这些成果的结晶。

选入本书的专题，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都曾反复征求过史事亲历者和专家的意见。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又对史实作了校正，对文字作了推敲。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错误和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特别是亲历史事的老同志予以指正。

关于专题资料征集研究情况的工作报告，凡对于了解专题资

料的完整性、准确性，了解当前党史资料工作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均改写为附记，刊于文末。

编 者

1987年11月

目 录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	
.....中共广东省党史资料征委会	(1)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和党团组织的建立	
.....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	(19)
湖南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33)
安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58)
毛泽东早期的建团活动和建团思想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66)
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光辉篇章——青年团“一大”	
.....广东党史资料征委会	(91)
建党初期以衙前为中心的浙江萧绍农民运动	
.....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	(10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及其在上海的主要活动	
.....上海党史资料征委会	(126)
毛泽东早期工运思想与湘区早期工运	
.....湖南省总工会 调 研 室	(14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对湖南农运的 领导.....湖南省博物馆	(16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情况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188)

- “驱赵联唐”中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
 ……………湖南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205)
- 湖南人民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的情况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216)
- 马日事变前国民党湖南省县市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和
 中共湖南省委的应变准备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32)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京(北方)区委同
 冯玉祥的联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245)
- 中共北方区委发动“首都革命”的经过
 ……………中共北京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256)
-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的斗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曾宪林 (266)
- 蒋介石在安庆策划“三·二三”反革命事变经过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282)
- 蒋介石在福建发动反革命政变和福建党组织的应变情况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 (296)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 在广东的传播

中共广东省党史资料征委会

一、二十世纪初广东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东人民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是流亡海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宋庆龄回忆说:“在1896年到1899年这个期间,孙中山曾到过欧洲各个主要首都,……孙中山知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活动,他已经听过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运动”。^①1903年,孙中山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共产党宣言》的日译者幸德秋水交往,就社会主义交换意见,自后益念念不忘社会主义。1905年春天,孙中山曾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主席和书记处书记,要求接纳他的革命组织加入第二国际。

1912年10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到上海在中国社会党本部演讲《社会主义学说及其派别》,连续讲了三天。

最早写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是同盟会会员,广东省番禺县人朱执信。1906年,21岁的朱执信,用“蜚伸”的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

^① 《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版,第462—463页。

命家列传》，以4000余字的篇幅简介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和十条纲领。

1906年9月，同盟会的另一会员、广东省惠阳县人廖仲恺，也以“渊实”的笔名在《民报》第七号上发表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不久，又在《民报》第九号上发表译文《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由上述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廖仲恺已将马克思主义与各派社会主义作过初步的比较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深具同情，而对无政府主义则持否定态度。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也在流亡海外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没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吾中国夙已有三”。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上述朱、廖、梁等人的著译虽在日本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但在国内却广为流传。当时以介绍马克思学说比较详细著名的，还有赵必振等翻译、日本福井准造著《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以及同一作者的《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这些中译本于1902年—1903年分别在日本和上海出版，现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大都还可找到当年收藏的版本，可见当时就已流传广东。应附带一提的是《近世社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译者赵必振，湖南武陵人，出生于广东南海，故字粤生，1900年因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逃亡日本，后赴香港办报，1907年往海南岛澄迈县创立澄江、迈江两学堂，宣传新思想。

总的说来，二十世纪初广东虽然已有少数知识分子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大概，民主革命派中有些人还将它的若干内容向国人作过介绍。但他们的认识，毕竟还是肤浅的，零星片面的，而且有不少误解，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可以说，当时广东乃至全中国还没有人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作系统的传播。

二、俄国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 在广东的传播开辟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共产主义开始从理想变为现实，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和全国各地的传播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11月10日)，孙中山革命民主派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用大字标题作了“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报道。11月23日，广州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也》以“俄国京都大乱”为题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12月28日该报以《过激派之俄国》为题报道苏维埃政府“现在势力愈盛，地位日益巩固，……将来可统一全国云”。同日又发表时事述评《李年(列宁)胜利之原因》，该报作出这些报道和分析，在客观上有助于广东人民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获得初步认识。

1918年春，苏俄政府宣布取消帝俄时代与各国订立的一切条约的消息，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对俄国革命“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同年8月底，列宁被反革命分子行刺重伤，帝国主义通讯社谣传他遇刺逝世。《广东中华新报》于9月14日发表短评表示惋惜。1919年7月16日，正当广州学生、商民和工人奋起“三罢”，反对桂系军阀之际，该报再次为文介绍列宁的生平小史。从该文残存的部分看，态度比较客观。

1919年8月，陈独秀的友人刘伯垂与在广州的部分湖北籍国会议员创刊《惟民》周刊。该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署名“玉斋”(胡祖舜)的文章《俄国波尔失委克(布尔什维克)之新写真》，以满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在各方面的措施和社会状况。

《惟民》周刊第一卷第二号，另一篇范鸿钧的文章：《这回欧战到底是那一方面胜利呢》认为：俄国和德粤的革命“从根本上改造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成立了一个新建的国家，这种‘理想’和‘主义’的大成功，应认为现世旧文明的死灭，新文明产生的一大关键”，这篇文章从内容看，明显地受到李大钊著名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影响。

十月革命对旅居俄国的广东籍华工和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东高要人刘泽荣（又名刘绍周），1918年至1920年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参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工作，并多次会见列宁，受到列宁热情的接待。刘泽荣在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时，曾代表该会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号召中俄两国工人紧密团结，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1920年6月，旅俄华工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列宁和孙中山为大会名誉主席。刘泽荣代表大会发给孙中山两份电报，邀请他前往苏俄，并要他转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大力协助中国青年革命事业和恢复中俄邦交。刘泽荣还应苏俄外交部和军事当局的要求，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用中文译载当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向参加红军的华工战士作宣传。

俄国十月革命使广东人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景，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十月革命除了它的直接影响外，它在亚洲各国的连锁反应，特别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对广东人民也有很大影响。1919年3月21日《广东中华新报》发表通讯：《日本人对过激派之心理》，报道日本“学生赞成社会主义者大部分，赞成过激主义者一部”，“劳动阶级闻过激之说，兴奋欲动”，同年6月13、14日，正当广州学生群起罢课之际，该报发表东京通讯《社会主义震撼日本》说，“世界潮流澎湃而来……社会主义已无形传布民

间”，通讯中还详细介绍了日本传播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和报刊以及社会主义者利用明信片散发传单70余万份，使“日本人民真正如梦初醒了”。十月革命在日本的反应传到广东，对广东人民的觉醒，无疑也是一种催化剂。

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 在广东开始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系统的和广泛地传播，是从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的。当时传播的渠道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日本，如《广东中华新报》的日本通讯和杨匏安根据日本报刊编译的《世界学说》。张亮翻译山川均著的《列宁传》以及留日回省学生澎湃等的宣传等；二是来自北京、上海方面，如《广东中华新报》和《广东群报》等转载京、沪出版的进步报刊文章；三是来自欧美方面，如《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等；四是来自苏俄，俄人在广州设立的通信社和瞿秋白、李仲武等由莫斯科寄回的通讯等。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报刊图书、集会讲演、组织社会主义讨论会、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和工人补习学校等

(1) 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杨匏安

杨匏安（1896—1931）笔名匏庵，籍贯广东省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早岁游学日本，开始接触当时流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归国后任职广州时敏中学和《广东中华新报》。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国内宣传新文化，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报刊，有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多达400余种。其中《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国民》、上海《民国日报》等著名报刊大量流入广东。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影响下，广东新出版了一批进步刊物如《惟民》、《爱国》等；一些原有的报刊为了适应新潮流，也开始革新版面

和内容以争取读者。如以归国留日学生为骨干的《广东中华新报》从1919年6月28日起，开辟《通俗大学校》副刊，除广泛介绍自然科学、心理学、医学卫生常识等外，特设《世界学说》一栏，自6月底起至12月底止，刊登了杨匏安（署名“匏庵”）的41篇译述文章。内容广泛涉及西方各种流派的美学、哲学和社会学说，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和唯物论、唯物论、实在论、实证论、实用主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宿命论、一神论、泛神论等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

杨匏安的41篇文章中，最长也是最主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11月11日起至12月4日止连登19天次，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世。文章一开始就盛赞“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之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1867年，此20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于此时大成”。

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关于唯物史观，他写道：“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的一元论而产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传以革命色彩者也。……生产之变化，即历史变化所由起。划分历史之时期者，生产之手段（器具机械）也；演出社会之阶段者，生产形态也。而此种阶级之战争，即人类历史焉。”文中着重指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化的“最高动因”。任何社会的政治法制和精神构造必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生产力

受束缚，其结果必然发生社会革命。

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余工余值”（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发生阶级冲突的根源，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工人阶级“起而取得国家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乃是采取敌对形式之最后者”，阶级斗争亦必将随此生产方式而“同时告终矣”。

就目前所知的文献来说，杨匏安这篇文章是广东地区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对广东人民的新觉醒，起了重要作用。它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不朽丰碑。杨匏安的另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也在该报同年10月18日至28日连续登载了11天次，介绍了从巴贝夫、欧文、圣西门、傅利叶，到马克思等各派社会主义思潮。

1922年2、3月，广东区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期间，杨匏安又为团的机关刊——《青年周刊》写了创刊《宣言》和白话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在第4、5、6、7期连续登载。《宣言》公开声明：“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宣言》除了注重劳工运动，促使劳工觉悟，帮助劳工组织以“实行革命”外，特别强调：“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这种重视结合本国国情，强调工农联合，以争取无产阶级的支配地位的思想，出现在1922年初，无疑是十分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浅说》一文比两年前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以更通俗、明快和更有条理的形式重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学说，公开号召“劳动者奋起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改组之前，没有明确规定信奉那种社会主义，团员思想混乱，不仅无政府主义占居优势，其他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在团内也很有市场。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后，团章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

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广东团以团员为基干，组织了“社会主义讨论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杨翰安这篇文章，正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受到广大青年热烈欢迎，对帮助他们抵制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起过很好的作用。

（2）陈独秀第一次来广州的宣传活动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来广东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即省教育厅长），至1921年9月离粤返沪。在这期间，他除了担任整顿和革新全省教育以及筹办大学外，对重建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起过重要作用。

陈独秀来粤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发行部（新青年社）设在广州昌兴街28号，以合法的地位出版和发行《新青年丛书》，如柯祖基（考茨基）著恽代英译《阶级斗争》、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以及陈独秀等的《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中国共产党“一大”后，于9月间在上海秘密成立人民出版社，作为党的出版机构，计划系统出版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公开的社址是广州昌兴马路26号。它相续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特全书》等若干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党礼拜六》和《列宁传》等。这些书刊的发行，大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地区的广泛传播。

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毕业生谭鸣谦（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重新组成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同年2月，陈独秀又与沈玄庐、谭平山等创办《劳动与妇女》周刊，宣传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同年6、7月，陈独秀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作为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关，设

省立注音字母教导团和机器工人补习学校，向平民工人推广通俗教育和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员养成所分专门班与通俗班，专门班一年毕业，通俗班半年毕业，第一期两班各招学员30名。陈独秀委派陈公博为所长，谭植棠为教务主任，谭平山、杨章甫等为教员；课程有国语常识、社会学、共产主义知识等；又派张毅汉为省立注音字母教导团主任，该团除了日常到街头向群众传授注音字母外并举办中小学教师注音字母讲习班。陈独秀、谭平山等常到这些学校团体宣讲社会主义，为广东党团和工会培养了不少干部。

陈独秀在广州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先后发表了40余篇文章、演讲词和通信，登在《广东群报》、《新青年》、《劳动与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主要内容除了强调“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学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外，着重宣传了下述几个观点：

第一，宣传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观点，鼓励青年学生“与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打倒，……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①

第二、宣传“军人自决”和提出做新军人的两大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象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和现在俄国的劳农兵，都是军人而有生产力的好榜样。”②

第三、宣传妇女解放与劳动者的解放一致的观点，指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第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是陈独秀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如所周知，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

① 陈独秀，《工学生与劳动运动》，《广东群报》1921年1月28、29日。

② 陈独秀，《欢迎新军人》，《广东群报》1921年1月1日。

播很早，辛亥革命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就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和“心社”，大量翻印散发无政府主义书刊。五四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广东占据明显的优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障碍。特别是1920年共产国际派别斯林等来到广东，建立通讯社，经黄凌霜介绍广州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广东共产党”，出版《劳动者》周刊，以“广东共产党”的名义散发传单，更使人感到鱼龙混杂，真假难分。因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无政府主义，就成为广东思想界的当务之急。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讲演《社会主义批评》，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与陈独秀关于绝对自由与法律存废问题的论战，彼此以书信形式往复反驳，总共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六封信。同年8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重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论战的重要文献之一。同年夏天，陈独秀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革命与制度》等文章，严厉批判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虚无和堕落。尽管陈独秀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还存在不少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对分清真假社会主义、纯洁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在广东乃至全国，都起过深刻的影响，为重建广东党组织作出了贡献。也许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广州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干部培训、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重建党团等活动，成效比其他小组突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早的作者葛萨廖夫写道：“广州小组的成立，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页第一行。”

(3) 从《政衡》到《群报》——谭平山等人的宣传活动

中共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陈于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三人，都是1920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